

# 三国演义 创作论

叶维四 冒 炜

著

江苏人民出版社

# ==== 三国演义 创作论

叶维四 冒 炯

著

首都师范大学图书馆



21014240



江苏人民出版社  
1014240

## 《三国演义》创作论

叶维四 著

---

江苏人民出版社出版

江苏省新华书店发行 南通县印刷厂印刷

开本787×1092毫米 1/32 印张 11.5 插页 2 字数230,000

1984年9月第1版 1984年9月1次印刷

印数 1—11,900册

---

书号：10100·774 定价：1.20元

责任编辑 朱建华

## 目 录

12643/65

第一章 继承与创造	1
一、《三国演义》与古小说	4
二、唐诗对《三国演义》的影响	11
三、《三国演义》与《三国志平话》	15
四、《三国演义》与元杂剧中的三国戏	35
第二章 思想与艺术	64
一、《三国演义》的主题	64
二、《三国演义》的正统思想	76
三、《三国演义》的忠义观	96
四、《三国演义》的历史真实与艺术真实	109
五、《三国演义》的结构艺术	123
六、《三国演义》的悲剧特色	136
七、《三国演义》的细节描写	153

八、《三国演义》的战争描写	169
附一、“群英会蒋干中计”的人物塑造	
附二、“失街亭”——写战与写人相结合的范例	
九、《三国演义》的局限和糟粕	198
第三章 人物论 212	
一、诸葛亮	212
二、关羽	232
三、张飞	248
四、曹操	261
五、司马懿	281
六、“江东三杰”	294
第四章 作者、版本、成书年代 320	
一、罗贯中与《三国演义》	321
二、《三国演义》的两种重要版本	327
三、《三国演义》的成书年代	359
后记 364	

# 第一章 继承与创造

我国著名古典长篇历史小说《三国演义》，是一部以丰富、浩瀚的三国历史资料为素材的史诗般的伟大作品。它的诞生，不仅是最后加工成书的我国中世纪艺术家罗贯中的辛勤建树，而且也是包括三国以后历代创作三国故事的古小说作者、民间艺人、剧作者以及历史学家们共同创造的文学工程。它是作家的才华和人民群众的智慧相结合的典范。

直到目前为止，我们所能看到的《三国演义》最早的版本，就是明嘉靖壬午年（公元1522年）刊印的《三国志通俗演义》<sup>①</sup>。这个本子共分廿四卷，每卷书名之下标明：“晋平阳侯陈寿史传，后学罗本贯中编次”。这说明了《三国演义》同《三国志》有着十分密切的关系。

晋人陈寿所编《三国志》是一部系统地翔实地记述三国历史的专著，全书共分六十五卷，分为《魏志》、《蜀志》、

<sup>①</sup>关于《三国志通俗演义》的最早版本说法不一。一说认为最早版本应是明弘治甲寅年刊本，因为该书有庸愚子弘治甲寅仲春所写的序文冠于书首。一说认为最早版本应是明嘉靖壬午年刊本，书中有髯修子所写的《〈三国志通俗演义〉引》为凭。虽然书中附有庸愚子一序，但其序文中并未提及刊刻的事。只说：“书成，士人君子之好事者，争相誉录，以便观览”。可见庸愚子序本尚在民间传钞阶段。目前研究者多持后一种说法。

《吴志》。南朝宋文帝又命裴松之为其作注（《四库全书总目提要》：“三国志六十五卷，晋陈寿撰，宋裴松之注。……宋元嘉中，裴松之受诏为注……”）。裴注征引汉末和三国以来的许多史籍，保存了大量史料。这些史书为后来以三国故事为题材的文人创作和民间文艺提供了原始的丰富素材。《三国志》及裴注中的三国故事在民间流传了一千多年，被历代文人、民间艺人和人民群众不断地渲染、发挥和加工、改造，在古小说、宋元话本、元杂剧中，都保留了这种创作的绚烂多彩的成果。至元末明初，《三国演义》就应运而生了。它以《三国志》等史书记载的史实为基础，集历代以三国故事为题材的艺术创作之大成，成为我国文学史上反映三国历史题材的第一部最有成就的历史小说。明代学者高儒就曾概括过《三国演义》“据正史，采小说，证文辞，通好尚……陈叙百年，该（概）括万事”<sup>①</sup>的创作特点。鲁迅先生在《中国小说史略》中更明确指出罗本《三国志演义》“凡首尾九十七年（公元184—280年）事实，皆排比陈寿《三国志》及裴松之注，间以仍采平话，又加推演而作之；论断颇取陈裴及习凿齿孙盛语，且更盛引‘史官’及‘后人’诗”。当然，《三国演义》据正史，并不限于《三国志》及裴注，它还参考了其他许多史籍，如《后汉书》、《晋书》、《资治通鉴》之类正史，博览了大量野史、佚闻。《三国演义》的作者不仅充分掌握大量的完整的三国史料，而且对我国封建社会的历史也有深入的研究。《三国演义》的主要内容，从历史发展

<sup>①</sup>明 高儒：《百川书志》。

的线索、过程到具体的历史事件和历史人物，大都可以从史籍中找到根据；它在传播三国历史知识方面是起了很大作用的。但更重要的是，《三国演义》作为一部历史文学作品，它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我国封建社会的历史真实，揭示了我国封建时代战争的本质与规律，成功地塑造了我国封建统治阶级内部各种典型人物的形象，提供了丰富的历史经验。

所以，顾名思义，《三国演义》同记述三国史实的《三国志》等史书是有密切关系的。但是，它们之间又有严格的区别。史书重在记述历史上发生过的历史事件和存在的历史人物，阐述历史发展的规律，属于科学的范畴；尽管作者也有自己的观点、倾向，但它要求尽可能客观、真实地记述。而历史文学作品虽以历史为基础，但它重在塑造艺术形象，抒发感情，属于艺术的范畴；它有虚构的权利，不仅可以写历史上发生过的事，而且允许写可能发生的事。因此，《三国演义》姓“文”，不姓“史”。过去，史学界和文学界对《三国演义》描写的某些人物和事件，往往在真实性问题上发生争论，相当多的原因就在于忽略了史学和文学的这一根本区别。

正由于《三国演义》属于历史文学作品，所以，我们研究它的继承和创造的关系时，自然是从事文学的观点来研究的，主要是考察它对元代以前以三国历史为题材的文人创作和民间文艺的继承关系。至于它的历史真实与艺术真实问题将在第二章讨论。

## 一、《三国演义》与古小说

我国魏晋六朝笔记小说中已出现不少三国故事。鲁迅在《古小说钩沉》中所辑录的古小说，如《语林》、《小说》等，就有这类记述。

晋人裴启的《语林》，记述三国时代的人物、故事比较集中，它提到的三国著名人物就有郑玄、董昭、荀彧、孙策、刘备（豫州）、管宁、华子鱼（歆）、诸葛亮（武侯）、司马懿、诸葛靓、孙休、曹操（魏武帝）、杨修、何晏、嵇康、邓艾、孙皓、钟士季（会）等等。记述大都是一人一事，言简意赅，往往几句话，就能写出人物的音容和个性。如：“管宁尝与华子鱼少相亲友，共园中鉏菜，见地有片金，挥锄如故。与瓦石无异；华捉而掷去。”这里鲜明地对比出两人不同的情态个性：管宁见金犹如未见，与瓦石一样对待，而华子鱼却把它拾起，虽也扔掉，但却有重金之心。这一故事后被写进了元杂剧《终南山管宁割席》，也为《三国演义》所吸收。

《语林》所记述的许多故事，大都成了《三国演义》创作的素材。除了上述管宁与华歆的故事外，还有诸葛亮与司马懿战于渭水的故事、曹操梦中杀人的故事和杨修析曹娥碑“绝、妙、好、辞”的故事等等。

诸葛亮与宣王在渭滨，将战，宣王戎服莅事；使人观诸葛亮，乘素舆，著葛巾，持白羽扇，指麾三军，众军皆随其进止。宣王闻而叹曰：“可谓名士矣！”

《三国演义》中写司马懿对诸葛亮敬畏三分，从这里已见端倪。

关于对曹操的记述写道：

魏武云：“我眼中不可妄近，近辄砍人不觉，左右宜慎之。”后乃阳冻眠，所幸小儿窃以被覆之，因便砍杀，自尔莫敢近之。

这是写曹操梦中杀近侍的恶行，于此可见曹操的狡诈阴险。在《三国演义》中，它被作为塑造曹操奸雄性格的一个生动细节，只是增加了杀后命厚葬之的内容。

魏武将见匈奴使，自以形陋，不足雄远国，使崔季珪代当坐；乃自捉刀立床头。坐既毕，令人问曰：“魏王何如？”使答曰：“魏王信自雅望非常，然床头捉刀人，此乃英雄也。”魏王闻之，驰遣杀此使。

这也是描述曹操的奸雄性格，有明显的贬曹倾向，是塑造曹

操性格特征的生动素材。所以，《三国演义》把它作为典型细节加以描写，几乎没有多大改动。

再一则，写杨修解释“绝妙好辞”的故事：

杨修字德祖，魏初弘农华阴人也，为曹操主簿。曹公至江南，读曹娥碑文；背上别有八字，其辞云：“黄绢幼妇，外孙蒜臼。”曹公见之不解，而谓德祖：“卿知之不？”德祖曰：“知之。”曹公曰：“卿且勿言，待我思之。”行卅里，曹公始得，令祖先说。祖曰：“黄绢色丝，‘绝’字也；幼妇少女，‘妙’字也；外孙女子，‘好’字也；蒜臼受辛，‘辞’字也。谓‘绝妙好辞’。”曹公嘆曰：“实如孤意。”俗云：有智无智隔卅里，此之谓也。

这一则故事，同样为《三国演义》所采取。我们在南朝梁代殷芸的《小说》里，还可见到与此内容类似的故事：

蔡邕刻曹娥碑傍曰：“黄绢幼妇，外孙齑臼。”魏武见而不能晓，以问群僚，莫有知者。有妇人，浣於江渚，曰：“第四车中人解。”即称正平也。衡便以离合意解绝妙好辞。

这里是记述祢衡解释的“绝妙好辞”。《三国演义》中所采

取的是前者而非后者。因为祢衡一贯藐视奸贼曹操，决不与曹操为伍，而杨修则世代为官，也颇受曹操重用；同时写杨修解“绝妙好辞”，正符合人物性格特征，有助于表现杨修的才智超人，并可与后面写杨修犯曹操之忌而被杀相印证。《小说》也记述了一些三国时代的人物和故事。如曹操的多疑性格和凶杀行为的传说，曹操会见和追杀匈奴使者的故事等。还有一些故事虽未为《三国演义》直接采用，但它却为塑造作品人物形象提供了某些客观依据。例如曹魏后期的名将钟会，就有一则故事这样记述：

钟毓钟会少有令誉，年十三，魏文帝闻之，语其父繇曰：“令卿二子来。”於是敕见。毓面有汗，帝问曰：“卿面何以汗？”毓对曰：“战战惶惶，汗出如浆。”复问会：“卿何以不汗出？”会对曰：“战战栗栗，汗不敢出。”又值其父昼寝，因共偷服散酒。其父时觉，且假寐以观之，毓拜而后饮，会饮而不拜。既问之，毓曰：“酒以成礼，不敢不拜。”又问会：“何以不拜？”会曰：“偷本非礼，所以不拜。”

这则故事，在罗贯中的《三国志通俗演义》中虽没有直接采用，但对钟会的聪颖奇才却在作品中作了概括介绍：“姓钟名会，字士季，太傅钟繇之子，蒋济一见便称奇才，非常人也。司马懿与谈论，亦称王佐之才。”而在毛宗岗修

订的《三国演义》中，把《小说》里这则故事补充了进去，就把钟会之智描写得较为生动而有说服力了。

同样，值得我们注意的是，在古小说中对刘备和诸葛亮均抱歌颂态度，如《语林》记述：

孙策年十四，在寿阳诣袁术，始至，俄而外通：“刘豫州备来。”孙便求去，袁曰：“刘豫州何关君？”答曰：“不尔，英雄忌人。”即出，下东阶，而刘备从东阶上。但得转顾视孙足行，殆不复前矣。

在《小说》中，亦有类似记述。这里显然视刘备为当今的英雄人物。《小说》里另一则故事是对诸葛亮的歌颂：

桓宣武征蜀，犹见诸葛亮时小吏，年百余岁。桓问：“诸葛亮相今与谁比？”意颇欲自矜。答曰：“葛公在时，亦不觉异，自葛公歿后，正不见其比。”

从这百岁高龄小吏口中，淡淡数语，十分幽默、机智地评价了诸葛亮是个世之无比的历史人物。

在魏晋南北朝的笔记小说中，还有一部值得注意的作品，就是南朝临川王刘义庆及其门下文人所编纂的一部笔记小说《世说新语》。这部笔记小说主要记述了汉魏至东晋时期的士族阶级的遗闻轶事，与《三国演义》描写的历史

时代正相合。所以，其中有不少三国时代的历史人物和故事，成了《三国演义》创作素材的来源之一。

《世说新语》虽属于前朝遗闻轶事的记述，然而，经过编著者的整理和加工，已渗入了编著者的观点和爱憎感情。其中贬曹的思想倾向是比较明显的。如写曹操在年轻时曾去拜见当时的名士乔玄。乔玄用“乱世之英雄，治世之奸贼”来评价他。这一评价虽同《三国演义》的描写稍有出入，但它已把曹操的主导性格“奸”和“雄”联系在一起。所以在写到曹操的故事时，固然不把他作为正面英雄人物给予肯定和赞扬，但也不是把他写成一个豆腐渣式的反面形象，而是赋予他以机智和奸诈的性格特征。例如有一则故事写了曹操在一次行军中，由于气候酷热，众军士口渴，他就机智地指说前面有梅子树林，使将士们“闻梅止渴”而坚持继续前进。这同《三国演义》中所写的“望梅止渴”的典故同出一辙。

在《世说新语》中还描述了诸葛亮同司马懿的斗智。《诸葛亮之次渭滨》一则中，写诸葛亮驻军渭南，要与司马懿进行决战，而司马懿也扬言应战，但却坚守不出。诸葛亮派人打探，才知道是辛毗拿着大斧守着军门，故司马懿的军队不能出来。这里既正面表现了诸葛亮而又不贬低司马懿。这一基本观点同《三国演义》作者对待诸葛亮和司马懿的态度基本是一致的。这则故事在《三国演义》中删去了辛毗拿着大斧守门的不合理情节，增加了诸葛亮送去妇人衣服以羞辱和激怒之，而司马懿仍然按兵不动的生动情节，说明了司马懿与诸葛亮正是棋逢对手。

《世说新语》中对于品德、才学兼优的知识分子也是歌颂备至的。这里写到曹子建七步成诗、杨修的才思敏捷，以及孔融幼时聪慧的故事等等。这些故事，大都为《三国演义》所吸收。

以上分析，可以看出古小说对于《三国演义》的创作有重要的影响。这些小说，内容虽然十分简要单纯，文字较少，人物刻画也较粗略，然而，《三国演义》的作者却直接、间接地从这些材料中得到不少启发，有些素材甚至被直接移植到《三国演义》中去。而且，它们的观点、倾向也影响着《三国演义》的创作思想。

在古小说中，我们还可以发现不同作者的小说记述了同一个故事。如上述“孙策见袁术”在《裴子语林》和《小说》里都有同样的记载。邓艾的“凤兮凤兮，则是一凤”，《裴子语林》写过，而在《世说新语》中也有。类似此种情况，较为多见。而这些作品大都出于同时代或时代相近的作者。可见三国故事和人物在当时是相当流行的。这种流行情况在历史上是一直存在的，以致有的故事和人物在唐代的佛学著作中也反映出来。如《四分律删繁补阙行事钞》有篇文字《僧像致敬篇》，其中有条小注便提到“似刘氏重孔明等”。而这条小注在唐人的注疏中，以故事的形式作了这样的解说：“注云，‘似刘氏重孔明’者，刘备也，意三国时也。……蜀有智将，姓诸葛，名高（亮），字孔明，为王所重。刘备每言曰：‘寡人得孔明，如鱼得水。’后乃刘备伐魏，孔明领兵入魏，魏国与蜀战，诸葛高（亮）于时为大将军，善

然谋策，魏家唯惧孔明，不敢前进。孔明因致病垂死，语诸人曰：‘主弱将强，为微所难，若知我死，必建（遭）彼我（伐）。吾死已后，可将一袋土，置我脚下，取镜照吾面。’言已气绝。后依此计，乃将孔明置于营内，于幕围之，刘家夜中领兵还退归蜀。彼魏国有善卜者，意转判云：

‘此人未死。’何以知之？踏土照镜，故知未死，遂不敢交战。刘备退兵还蜀，一月余日，魏人方知，寻往看之，唯见死人，军兵尽散。故得免难者，孔明之策也。时人言曰：

‘死诸葛怖生仲达。’……其孔明有志量，时人号为卧龙，甚得刘氏敬重。”这一段描绘，虽与史实不尽符合，但并未脱离历史人物的原型，与古小说中的三国故事有联系，并与民间传说、俚巷传闻交织演化而来。这说明古小说中的三国故事流传之广泛、久远。《三国演义》吸取古小说和民间故事的素材、养分，乃是创作的必经途径，也是它取得成功的重要原因之一。

## 二、唐诗对《三国演义》的影响

唐代是我国诗歌的黄金时代，唐代文学以诗歌成就最为显著。清代编纂的《全唐诗》所录的诗人就有二千二百多家，诗作四万八千九百余首，这还远非唐诗的全部。虽然，我们从唐代民间文学中尚未发现三国题材的作品，但从唐代

诗歌中却可推断讲说或演唱三国故事的市民文艺在唐代已经流传。李商隐《骄儿诗》中的“或謔张飞胡，或笑邓艾吃”，就可说明某些三国人物故事在当时已是妇孺皆知的了。不过，迄今尚无足够史料，确证这种民间文艺的发展及其对《三国演义》创作的影响。但是，我们完全可以从唐代文学的主流——诗歌看到三国的历史题材在唐代文学创作中的地位；而且，还可以看到吟咏三国历史人物的唐代诗歌，对罗贯中的创作思想和提炼素材都产生过积极的影响。

唐代诗人描绘和吟咏三国时代风流人物的诗篇很多，而诗中写得最多的要算诸葛亮。在杜甫诗集里面，就有二十多首吟咏或提及诸葛亮的。《三国志通俗演义》卷之二十一，“武侯遗计斩魏延”，写到孔明灵柩迁葬后，后主令建庙于沔阳，四时享祭。后杜甫亡命巴蜀时，见庙前大柏树，乃三国时所种，有感而作《蜀相》曰：

丞相祠堂何处寻？锦官城外柏森森。  
映阶碧草自春色，隔叶黄鹂空好音。  
三顾频烦天下计，两朝开济老臣心。  
出师未捷身先死，长使英雄泪满襟。

《三国志通俗演义》还录了杜甫的另一首哀悼诗：

长星昨夜坠前营，讣报先生此日倾。  
虎帐不闻施号令，麟台惟显著勋名。